

# 一九六九年的共匪經濟——貿易和農業

沈國權譯

(60) 四四六

就共匪的經濟政策而言，再以今年共匪所表現的經濟事實來看，可以說是毫無進展，自去（一九六八）年共匪之「文革」結束以來，共匪之經濟政策，完全建立起一個新的經濟結構。而此一新的結構，乃依據毛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所做的指示而來。希望藉此能減少工人，農民，軍人和知識份子之間所造成的裂痕。共匪的工業政策乃擬自城市移向農村發展。城市之居民，則遷遭到人民公社中去，工人執掌管理工作，農民則制定新的農村政策。小學由工人和農民來督管。總而言之，今天大陸上，每一個人的工作，只有受到精神上的鼓勵，却得不到物質的刺激，這也就是新的農村政策最大的變化。

這些變化，在大陸的某些地區，實行時，受到很多的阻力。因而，共匪不得不向現實低頭，而採取妥協的政策，這就好像耕種農作物，不能不順乎自然一樣。匪區有一個很明顯的動向，那就是共匪所掀起的變動，比之於一九五八年時，所造成的社會混亂和工業的激變等等，似乎更具危機。相信共匪深深體會到當日所實行「大躍進」的慘敗結局。在人民公社方面，這次變化，却比一九五八年所發生之變亂，則稍見和緩。至於談到所謂發展中的小型工業，和一九五八年之土法煉鋼之災害，更具欺人之談。

不論如何，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共匪所做的這些激進政策，能够達成永久的結果，和更能使人民接受。事實上，共匪人民日報，紅旗和解放軍日報所發表的聯合社論，強調要人民完成共匪指示過的經濟政策。

共匪準備將這些政策付之實施時，但是在全體逞分裂狀態的領導幹部中，似乎難能達成使命。因而，共匪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壓力。關於共匪高級幹部內部關係的問題，却是複雜的。但共匪政策的改變，必需顧及地方性和季節性的問題。正當共匪謀變之當兒，凡是所謂反毛派的那一夥人，諸如劉匪少奇的同路人，在「文革」時被罷黜的人，和在四月份共匪召開「九大」時

被剔除的一些經濟學家，這些人，當此時候，正是出而行動的好時機。陳匪雲和李匪富春，都是政治局常委會和經濟學家之名人，此次都未經提名。不只是在常委會未見提名，即便在政治局本身也隱名未見。又如聶匪榮臻，是負責國務院科學部門，也被排除於政治局的大門之外。

陳匪雲已有數年不知其去向，而李匪富春為偽計劃委員會主席，李匪可能參與最近之經濟計劃。至於陳匪雲的失蹤有兩種假說，一說是由於彼之健康情況不佳；另一說則可能和毛匪鬥爭被黜。（陳匪在「大躍進」以前即沒有活動）再談到劉匪少奇，彼從當權派中倒了下來，其最大原因，乃基於和毛匪的經濟政策有所違背。不論怎麼說，今天匪黨的行動，由內部的秘密會議左右了一切。所謂左派（包括周匪恩來和偽財政部長李匪先念等）乃走的同一路線。而匪區經濟之所以不能協調，乃由於在政策上各持己見所造成。這種不協調之癥結，可能在於匪黨中央和省之間所引起；也可能是省與地方之間的不能一致。因此，就產生一個問題，在地方上如何能使新的政策期於加速實施？

共匪所策劃的重心是想使得農村能自給自足，這不僅在於糧食自足，也同時要使肥料、農具（若在鄰近之城市能够得到亦可），甚至電力亦不例外；同時要辦理小型手工業工廠，保健計劃和自辦小學等。其中之保健計劃是屬於捐助性的，因此醫療和設備的費用無法充足。由公社中之大隊來辦理的新小學計劃，除去部份的老師薪水不要負擔外，其餘的一切費用均得由大隊負責。老師們可以得到津貼，但這却是在以工分計算時，若少於以前所得標準時，才能這樣做。學校裏的建築和設備費用，也由大隊自籌。同時學校所應完成的工農計劃，也由大隊自理。

所有上述之投資資金均需增加，因此，農民們則擬動用他們的存款。據報導，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冬季期間，廣西省方面的公社，有合併事情發生

，如此使得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單位擴大。趁此機會，能使得他們屬於自己的經濟，加以利用，因為他們希望自己的事情由自己來管理。

當一九五八年，共匪第一次計劃在農村實行「自給自足」，和「全包」方式時，但當公社的成分改變為更小型和更便利於運用的單位時，但在「大躍進」以前，自由主義化之時期，上述政策却已解體。在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有一種新的政策加強於生產大隊。因為生產大隊在公社中居於中間型的單位，用以代替最小型的生產隊。這些都是走「大躍進」時期的老路。現在以生產大隊來舉一個例，共匪把生產大隊命名為農村的單位，大凡農村中的學校和新的醫療保險計劃，均由大隊負責，如果共匪想取得財源和進行新的公社計劃，那麼大隊是好的托付對象。

農村所實行的工分制，是按照公社社員的人數，付給社員們的所得分配；此項制度曾做過修正。在舊有的制度之下，乃按照大寨大隊之所得標準而定立的。共匪就拿這項標準作為全大陸純理論性的一項實例。工分的給予，乃依照個人之政治情況而定，此項制度，廣為採行。同時有很多居住在農村的民衆也採用此法。現在以教師為例來說明，在新制度所組成學校的老師，其薪水亦以工分作為給付之依據，同時也依工分之多少作為農村代表的產生，和市場上的合作和信用的合作等之參考。也是他們以前作為給僱工的薪金之依據。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對農村所加强的冬季運動，其目的是對公社盡可能給予更多的責任。把非屬僱用性的學生和已貶之匪幹，從城市下放到農村，以期完成匪黨所交付的任務。農民們雖逃脫了共匪「文革」的惡運，雖然如此，但農民們也沒有得到休息，同時也未逃脫政治上的壓力，一直到三月份春耕來臨時，其時，共匪加強推展每年定期的春耕工作才得解除。

農村的工業化政策，繼續在很多地方展開。共匪人民日報在二月份有一篇重要的社論，認為「兩條腿走路」，這是過去在「大躍進」時之標語。首先的小型生產方法，是認為應該土洋並重，以此，而揉合成為一項新的、現代化的生產政策。跟隨在夏季的時期，此項運動，推展時似有相當大的規模。共匪準備履行該項政策，態度似乎相當頑強。公社和其他的機構想建立一個工廠，作為產品供應市場的來源，以進行一項漫無目的的「大躍進」之農村工業化。有些計劃則正在進行尋找最好的地方做為建廠之用。

共匪一九六九年四月份召開「九大」以後的數個月中，以其總的經濟政

一九六九年的共匪經濟——貿易和農業

策來看，是走下坡路。共匪內部的政治問題，似乎有增無減。回溯到「文革」時期匪徒們的鬥爭，全大陸匪偽的「革委會」，均處於分裂的狀態中。總之，在此情況下，利用任何辦法，亦難能有所成效，特別是「革委會」的分裂。這不是一項平常的事情。這樣下去，則會演變成「無政府主義」和「黨派主義」的起而作亂，會把工業搞垮；同時低水平的行政效率，也會使匪黨的行動亂了脚步。一連串的罪惡的發生——「山頭主義」和其他的問題——這是共匪所公認的一類問題，這是人民在「文革」進行期中，希望能繼續取得自由的一種癡兆。如此，工人們知其情況必然會起而怠工。他們曾提出問題。他們認為，今天的工作，為什麼不採取每日工作八小時的制度。因為他們每天都可能工作超過八小時。因為我政府在未遷離大陸以前，凡超過規定時間者，均發給獎金，而今天在毛匪統治下之大陸，則沒有獎金制度，請問，工分又有何用。

如此，無政府主義的工人，在夏季時，則以破壞來表示反對毛匪政策的反應。他們也知道做為一個毛匪信徒，乃毛匪耍弄陰謀的一種手段。一九六六年的秋季，共匪開始在工業中實行一項革命性的競賽。根據推測，工廠被迫做到盡量生產，毛匪耍弄手腕，以不要物質刺激做為競賽目標，在本年的最後一季中所進行的；但同時又有一種跡象，那就是激進派推出一項新的運動，在九月份時，有某些跡象顯示，有一項新的官式生產方式，可能有些種類在共匪偽「國慶」時來宣佈。由此，使所謂「革命理想」而重新展開。

一九六八年，共匪忘却先前在秋季所推行的革命計劃，而又在翌年春天又停止了進行。現在秋季又將來臨，這將是第二次的開始。共匪採取進兩步退一步的政策，這似乎只是革命化的口號，至於生產能否在這種政策下有所作為，那就只有讓我們來看看他的結果了。共匪曾認為進兩步退一步的辦法是可以採用的。因為共匪認為，如果中國人民都能有充分的毛匪思想的教育，來從事老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話，可能會行得通。但我們要研究一個問題，那就是，人性真的能够改變嗎？

## 貿易

在一九六八年的下半年，共匪對外貿易稍有恢復，在該年的上半年，共

匪對外貿易與一九六七年同期下降約百分之十六。但全年之輸出，則與一九六七年全年相若，在輸入方面，與同期下降約百分之九。

共匪輸出之不景氣，乃由於對香港出售的貨物減少，尤其是紡織品和家畜兩大項目影響最大。在一九六八年底，上述兩項物品及肉類、魚、米和蔬菜等方面，却又恢復為重要的出口貨物。現在不知道廣東省的秩序恢復到什麼程度。同時研究共匪的政策，還有很多是未知數。

由於政策的問題，在香港，以匪貨為再出口之貨源，則又重新受到打擊。自一九六八年的年中，由於共匪決定，以香港之外另設一支線，盡可能以直接方法和印尼、新加坡和其他的國家作貿易。以一九六八年整年的再出口的數目計算，曾達到五億五千萬港幣。但一九六七年却到達六億一千三百萬港幣，一九六八年比一九六七減少的原因，乃由於印尼的經紀人把採購量減少了。因而香港再出口的共匪原貨，輸出到印尼的數量，從一九六七年港幣二億八千八百萬元，降到一九六八年的一億五千五百萬元，在一九六九年的中期，香港再出口比一九六八年同期要好。事實上，大約增加了香港再出口總貨物之百分之卅六。目前，共匪似乎無意反對去供應香港稅倉庫之貿易。

另外一項是，日本打入香港市場，使匪僑坐立不安。在一九六七年時，共匪為供應香港物品之最大來源地，日本則居於次位。但到了一九六八年時，情況却有了大的改變，不過日本和共匪在香港商業上，其競爭程度是很小的。因為彼等相同之貨物只有紙張，紡織品，人造纖維，成衣，鐵和鋼材等。在一九六八年，共匪輸出到香港的上列貨物，只佔總量的百分之廿。事實上，日匪貿易處於一種困難的情況下。這是因為日本需要共匪傳統性產品的數量不多；同時又無增加的可能，尤其是日本極不願意購買共匪的食米。其原因是由於日本農作物豐收之故，致使日本國內需要減少。在另一方面，共匪又不願意供給日本所需要的煤。共匪賣給日本的煤，從一九六七年的美金一千五百萬元，降到一九六八年的四百萬美元，在一九六九年似乎仍會下降。

在一九六八年底和一九六九年初期，由於共匪輸入到日本的牛肉有問題，使得日匪貿易關係弄成一個複雜的局面。無可懷疑的，共匪需要在日本找尋一個肉類市場，然而在日本方面又不敢相信共匪的信譽，那就是在匪區可能有牛的口蹄病，因而日本方面不敢冒險進口傳染病。事實上，日本化肥工廠方面，由於要多賣一些化肥給共匪，對阻止進口匪區肉類的政策施以壓力

。最後，日本的農林部決定，是項牛肉以海運的方式運到日本。是項決定是由日本政府派員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到達北平後，商談重新恢復第二年的貿易協定備忘錄時決定的。第一年簽訂的時間是在一九六八年的三月。

日本的這項決定，共匪拒絕接受，日本方面因而也激怒了，日本政府則拒絕答應某些條款的保護作用。亦即(COCON)條款的決定，即日本的友誼公司不能前往北平和上海去舉行工業品展覽。由此，共匪對日本方面的申明比以前更加施以壓力，特別以日本和美國以及中華民國友誼方面為藉口，而譴責佐藤政府的是項態度。

日本方面由此就尋求一些方法來適應共匪需要。然而此一談判，竟拖延了六週之久，最後商談的結果是，在日匪貿易備忘錄之貿易總數，在一九六九年只有美金七千萬美元，這比一九六八年的一億一千萬元少了四千萬元，在日匪貿易總數中，只佔百分之廿而已。如此，貿易備忘錄的價值也會影響到第二年的數字。在日本方面，因為受到這種情形，其輸出總數只有四千三百七十二萬元，其中包括特別的五千萬噸不同種類的化肥和廿萬噸鋼鐵產品，日本的輸入品包括大豆、鹽和一些其他的產品。

一九六七及一九六八年共匪對外貿易

單位： 百萬美元	共 匪 輸 入		共 匪 輸 出	
	1968	1967	1968	1967
澳 洲	89.47	194.94	30.59	27.92
比 利 時	19.96	22.67	11.83	13.04
加 拿 大	151.15	84.46	27.70	23.19
錫 蘭	32.68	31.52	41.23	38.42
丹 麥	2.11	5.97	8.27	8.88
芬 蘭	11.52	12.00	6.97	9.41
法 國	87.68	93.22	53.34	48.11
香 港	7.36	8.37	400.89	397.25
大 利 本	61.10	73.58	48.00	57.76
日 本	325.44	288.32	244.19	269.46
澳 門	0.09	0.01	13.03	13.95
荷 蘭	28.87	12.25	27.15	27.78
紐 西 蘭	5.75	10.76	4.55	4.08
巴 基 斯 坦	25.49	34.69	29.62	33.66
新 加 坡	26.53	31.32	150.30	124.73
瑞 典	23.78	43.94	18.23	17.01
瑞 士	19.51	21.35	16.00	17.43
英 國	68.30	108.00	82.30	81.60
西 德	173.95	206.53	85.32	76.54
合 計	1,160.74	1,283.84	1,293.51	1,290.22

共匪對日本的鋼材和化肥的味口比其合同所規定者爲少，一九六九年六月份有廿個合同在北平簽定的，該項合同是關於供應共匪七十五萬噸日本的鋼材產品，更希望在秋季共匪出口商品交易會中出售四十萬噸鋼材。在一九六八年日本賣給共匪的鋼材只有九十八萬噸，這個數字只是任何一個歐洲廠商所握有的數字。一週以後，一項日本合約在北平簽字，這是有關賣給共匪三百廿二萬噸的化肥，總價爲九千八百四十萬元，在此情形下，日本所賣給共匪的貨品，超過一九六八年的數字。

一九六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共匪的廣東出口商品交易會，一般認爲是稍爲像樣的一次。比春季舉行時所見到的貨品的短缺和供應困難的情況，似稍有改善，但是價格上却比較高。共匪貨品生產型式的數目不多，仍然和以前一樣。看樣子，共匪的外匯的儲存，可能稍見好轉，因爲從日本、西德、義大利、法國，以及其他訪客中們認爲，共匪能够擴大採購鋼材，似乎有點關連。在一九六九年的春季商品出口交易會中，共匪又採購了所需要的鋼材和化學藥品。雖然不是一項大的交易，但共匪在生產短缺的情形下，似乎受到了與會人士之注意。不過，共匪所舉行的展覽會，成果平平。

所有西歐的鋼鐵生產的國家，似乎在一九六八年很少把該產品賣給共匪，日本的競爭情況在蘇滋（Suez）運河完成以後得到了改進，這却是主要的原因。事實上，西歐諸國，在一九六八年，只有荷蘭是共匪的物資供應者，尤其是肥料加倍以往的數目賣給共匪。共匪賣給西歐的情況，一般來說，是不太景氣的，只有西德向共匪增購了相當數量的米和其他的食品。

共匪仍然是一個需要小麥的市場，而澳洲則是一個最好的小麥賣主。通常澳洲的小麥賣給共匪的數量佔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但共匪在一九六八年購買澳洲的數量作了激劇地下降，一方面是由於一九六七——六八年澳洲的乾旱，小麥減產；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受貿易合同的限制。在一九六九年的六月，規定澳洲賣給共匪二百廿萬噸小麥，運送日期到一九七〇年三月止。總款數爲一億二千五百萬元。這一項合同對澳洲小麥委員會來說，是一項大的安慰；不過，這比一九六八——六九年的估計運送數字却少了百分之廿。

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前，共匪曾和加拿大簽定了一宗長期性的合同，乃爲運送給共匪一百五十五萬噸的小麥，總價款爲美金一億一千五百萬元。這項發展乃是澳洲——這是一項錯誤的交易——當作一項加拿大打算承認共

匪的報酬。澳洲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又增加了數量時，法國在一九六八年已賣給共匪小麥六十二萬公噸，同時更取得了供應八十萬噸的合同。這是因爲法國同意共匪輸出相當數量的豬肉。但這項合同是處在歐洲共同市場諸國中爲難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法國國內又怕共匪的豬肉帶進豬熱傳染病。法國在前兩年並沒有賣給共匪小麥，但在一九六二——六三年時賣給共匪一百萬噸小麥，後來在一九六四年——六五年也賣了一筆小數目的小麥。當時的價格是，每噸爲十七鎊十仙令。這項數字的賣出，很顯然地是得到了歐洲共同市場農業基金會的補助。

英國賣給共匪的數目，從一九六八年九月，作了激劇的上升。但增加的物品只有白金、鋼和鉛。在一九六九年上半年賣給共匪的數字却二倍於一九六八年上半年的數量。這些包括了不含鐵的金屬和金剛石爲主要增加的物品。共匪和西德的貿易與英國的數字相彷彿。

共匪於一九六九年五月訪問歐洲的任務，乃是採購機械器材。這是在該年共匪向歐洲採購數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在另一方面，共匪似乎不想在西歐方面去費力，乃專心於比較容易進展的香港和新加坡的市場。自從一九六六年，共匪和香港、新加坡增加輸入共匪傳統的項目，諸如米和其他的食品，成衣和紡織品。由於新加坡和印尼之間貿易的合法化，因而在貿易上亦有所改進。同時由於新加坡作轉口貿易之貨源，乃採用共匪之出口之貨物之故。而且有很多匪貨轉到馬來西亞。同時共匪在馬來西亞採購橡膠的數量在一九六八年激劇上升。同時在新加坡也於一九六九年初購買了同一貨物。共匪曾經宣佈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向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採購了十二萬噸橡膠。這比一九六七年全年採購的八萬八千五百廿五噸要多，比一九六八年所採購的十二萬九千噸相彷彿。在一九六九年元月，錫蘭和共匪簽定了一項新的橡膠稻米的協定，在該年內規定錫蘭供應六萬二千公噸橡膠；同時共匪則供應廿萬公噸稻米。在一九六八年時，錫蘭以七萬五千噸橡膠換取共匪廿萬噸的稻米，在一九六九年時，橡膠數量之所以減少，乃是由於米價下跌之故。因爲一九六九年每噸爲五十一鎊相對於一九六八年時每噸五十六鎊十仙令。由此，錫蘭很顯然地接受了超過新加坡橡膠價格的貼收。無可懷疑地，在此情況下，錫蘭賣出橡膠的報酬願意拿米而不願意拿現金。

在任何情形下，一九六八年是買米的市場。共匪在此時期中所賣掉米的



數量為七十萬公噸，這和一九六七年的數量相同，另外還應該加上運到印尼和古巴米的數量。由於共匪賣給香港、錫蘭和其他國家數量增加的關係，因而賣給日本的米減到十萬噸；同時共匪也賣給巴基斯坦二萬五千噸。

共匪和蘇聯的貿易，在一九六八年開始下降，從一九六七年貿易總數自九千六百卅萬盧布降到八千六百四十萬盧布；蘇聯進口數量從五千一百萬盧布，降到三千三百萬盧布。據說，匪俄貿易協定在一九六九年開始在莫斯科談判，但結果如何，則不得而知。至於共匪和其他共產國家的貿易情況，却有升高趨勢。一九六八年波蘭和共匪的貿易數字從二千八百萬美元升高到三千一百萬美元，主要是機器和耐隻的交易；共匪賣給波蘭的總價為一千九百萬增加到二千五百萬元。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共匪和南斯拉夫簽定了一項貿易協定，貿易增加率為百分之十一。共匪又和捷克進行貿易，要捷克提供機器、卡車、起重機和其他工程方面的用品；而共匪則以豬肉和其他食品紡織品和礦產品等來換取。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共匪又和羅馬尼亞簽定貿易協定，其貿易數字亦見增加。

共匪一九六七——六八年的貿易數字表 單位 美金百萬元

國名	共匪輸入		共匪輸出	
	一九六九	一九六八	一九六九	一九六八
澳洲⑥	元.五〇	元.三三	一六.壹	一三.八二
加拿大⑤	五〇.七三	五七.六	二二.〇〇	四〇.三
丹麥②	〇.四三	〇.五二	一.一六	一.一六
法國	八.四九③	三.九四④	一七.〇〇③	六.七②
西德⑤	七.三〇	三.〇一	三.〇〇	三.〇〇
香港⑦	三.五	四.三	五.四	二七.六
日本⑥	二四.六〇	一三.三	一五.九〇	九.元
荷蘭	九.二②	三.〇②	二.四七①	三.九②
挪威②	一.五	一.五	〇.七	〇.九

新加坡	瑞典	瑞士(2)	英國⑥	合計
二六.六⑤	六.五⑤	二.〇	六.七	四七.〇三
一〇.三⑤	八.〇⑤	三.五	二.六〇	三九.〇七
一五.五⑥	二.六⑥	二.五	六.六一	五四.六
六四.六〇⑤	八.〇〇⑤	三.二	四.八九	五五.七九
五.〇〇⑦	七.六⑤	二.五	三.六〇	四九.二三
六二.八七⑥	九.五⑥	二.八〇	四.四一	六九.三

註：括弧內的數字乃表示月份

### 農業

一九六八年，共匪的糧食收穫平平，或稍見減少。在同年十二月份初據報導，比一九六七年有相當大的增產地區只有四省，安徽、廣東、湖南和貴州四省。香港方面估計，共匪糧食總生產量為一億八千七百萬噸，這比一九六七年的豐收年的二億二千萬噸數字，下降甚多。

據估計，共匪一九六九年的冬小麥可能有些好轉，主要的小麥生產區為山東、山西、陝西，和河南為豐收地區，至於北平和天津地區的收成情況和往年相同。在揚子江之小麥生產區也報導為一個好的收成。據電台上海的報導，一九六八年的十三萬畝小麥和四萬六千畝的種子增產。據收聽共匪的廣播稱，共匪的氣象報導稱，在播種時期，有些地區發生乾旱，以致影響了播種的進行，不過，在主要的小麥產區獲得了適度的雪量，因而保護了作物。同時，在春季又得到了適度的雨量，在收割期的氣候也相當好。

但對共匪小麥的政策加以懷疑。小麥是營養作物，既高產也抗旱。據共匪新華社六月廿一日報導，現在小麥正在河北、山東、河南和陝西的六千六百萬畝的田地中成熟中，一九六八年只以山東省為例，據報導，就有三千六百萬畝冬小麥，河南是小麥生產最大的地區，比山東生產的數量還要多。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共匪以小麥的欠收却報導為進步，又却以進口作為補償，真是欺人之談。現以黑龍江為例，在此地有很多新的農業計劃已開始着手，現在就有一百卅萬畝的春小麥，在一九五九年春季報導，在該地只種了六十八萬畝的春小麥，看起來前後却存在着矛盾。

早稻的種植地區是在華南，以二月的陰冷氣候最不利於早稻的生長。很顯然的，有秧田必需在同一地方移植三次，氣候適於早稻生長的地區以廣東和福建為最適宜。因此華南作物種植時期比較晚一點為宜。揚子江流域在種植期不僅受寒冷氣候之苦，而且在七月又有暴雨，往往造成嚴重的澇災。因此，在湖北之南的黃湖（Huanghu），據說在六個月中就有兩週的大雨。據當地的軍人和居民說道，如果建立了毛匪思想研讀班，這就好像在人體上建立了一道堤防一樣，因此，水稻不會再受到洪水之害；而且可以種植更多的晚稻，和把握蕎麥又作為補償。乍聽起來確實可笑。

據說，一九六九年的早稻比一九六八年高百分之六，但是自然災害却肆虐了該地區，或在「文革」期中曾經減產過。據云，廣東省全年都可種植作物，稻米的生長是在浙江北部平原，據報導該地區增產百分之十。匪官方報導，早稻生產「很好」，但並未說明比一九六八年好多少。香港觀察家認為，可能只是稍有起色而已。

以一九六九年的九月中旬測估未來，情況看好。颱風外窩拉（Viola）在七月下旬，襲了廣東南部，而且相當嚴重。此時期，早稻可能已經收穫，但晚稻的育種，甘蔗，高地作物諸如甘薯餵豬之飼料，均會受到影響，不論如何，在華北的適度雨量，對高粱、小米和玉米均會有益。

一九六九年四月稻米開始下種，佔全大陸糧食作物種植總產量的百分之廿二，又佔糧食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四。在共匪出版的「偉大十年」報導，一九五七年稻米所佔的比率為種植面積的百分之廿七。其生產量佔百分之四十七。因此稻米在目前的生產量之重要性來說已見減低。稻米是一項高生產的作物。對匪區的耕種來說，一般均喜於種植穀類作物，同時穀類作物的耕種，自大陸的南方推向北方，已有多年歷史。

因此，在一九六九年的中期，黃河的北岸，亦即河南之北部，據說，在稻田裏移植了六千六百畝的鹽鹼土，由此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自黃河引水灌漑。黃河南岸之蘭高（Lankao），在一九六八年中移植了七百畝的鹽鹼土，並得到相當成效。潘欽（Panchin）之鹼土區域，在遼寧省的遼河流域，開墾了三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並作了同樣的工作，擬以山坡地區來發展種植稻米的計劃，但由於灌漑的問題而受到了限制。共匪在過去十年中曾修築了水利工程，想使得山坡地能生長各種糧食作物或為根菜類之作物。

一九六九年的共匪經濟——貿易和農業

在大陸的某些省份中，在百分之五十的早稻田中，採用了好品質的稻種，有些省份採用了矮種，因為矮種可以抗宿主寄生和風災。有一些好品種的稻種被喻為「奇種米」，這也是屬於矮種的，其主要的奇蹟是肥效大，並且需要一個完全的「技術包」（Technological Package），並且需要在正確的操作之下，來施用正確的肥料，乃為了能有好的結果。值得懷疑的是，大陸的農民能否保有這種條件，和能否獲得所需要肥料。

一九六九年曾聽說，當地的肥料廠，以供應當地肥料的需要；譬如，成都磷肥工廠，以礦土製造肥料，這是共匪過去從沒有採用過的。似乎更加强了——又稱為「大躍進」的時期，極像一九六九年共匪的農業——即利用綠肥和厩肥。現以廣東為例，該地在三月報導，曾施用了五十八萬畝綠肥，並且收集了三千噸厩肥；廣西省報導，曾施用了五十七萬畝綠肥。另一方面，共匪要增加豬隻生產。三月廿二日匪人民日報社論提到，關於增加豬隻以增加厩肥的說法，而為保證一項豐收重要的方法。按照毛匪的指令，但要在人民公社中增加養豬數量，即使每一個農民家中的主婦們，也應養一隻或是數隻豬。不管如何，當耕種季節來臨之時，對於掀起之運動，似乎無暇顧及。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的冬季，看到一項擴大水利工作成果之計劃。以廣東省為例，一九六九年三月曾報導，從去（一九六八）年冬季完成一億一千萬立方公尺土工，以作保水工事。在河南省南部的天伸地方報導，增加了灌漑面積，從「文革」以前的五千三百畝增加到六萬六千畝，尤其是三萬三千畝低地，時常積水之土地，因此而變成了生產土地。在此同時，林森地區在河南省北部，完成了一條七十公里長之紅旗隧道，從張河引水而來，可灌漑四萬畝田地。濟陽地區之西南部，很早便完成一項灌漑計劃，從清河連接一條新的百廿公里的水道而成為門河，其設計可灌漑三萬三千畝不毛之地。設計和建造的種稻機，在「大躍進」時期生氣勃勃地向前進行，在一九六一年時，此一運動又突然掀起，但應用以後，種植效率不高，或在種植時損壞了種苗的根部，即便有良好的技術和其他的方法幫助之下，也不能收效。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偽國務院曾將種稻機定名為東方二號引擎曳引機，在寧陽、湖南曾在八小時中種植了一、六公頃的稻米。

沒有努力推廣和發展種稻機，此項不當乃歸罪於劉匪少奇和他的同路人。但此運動又重新開始向前推展。在廣西張自治區，據說有三萬台種稻機在一九六八年在種稻區耕種了五萬三千公頃的土地。同時在湖南也廣泛地採用新的機械。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廣西南寧關於種稻機的問題又召開了一次「全國性」會議。在移植稻禾時是最化人力的一樣工作，但若用部機械，其利益若何亦難以預測。

刊物名：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4, 1969  
原題：1969; Year of Contradiction.